

港澳-珠江三角洲及其外围地区协调发展研究丛书

珠江三角洲人口迁移 与 劳 动 市 场

李 玲 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49831030)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项目——港澳-珠江三角洲及其外围地区协调发展研究成果之一。本书重点论述珠江三角洲人口迁移与劳动市场的问题。

全书共8章。第一章在界定人口迁移的概念与分类的基础上,回顾国内外学者在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人口迁移的研究;第二章回顾我国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类型的人口迁移,以及迁移人口对珠江三角洲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历程的影响;第三章分析珠江三角洲人口迁移特征,以及迁移人口对珠江三角洲人口发展的影响;第四章分析珠江三角洲人口迁移机制及其发展变化;第五章分析人口迁移对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与周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变化的影响;第六章从劳动生产率在三大产业整体、产业之间及产业内部差异的角度分析珠江三角洲产业结构转变与劳动力市场的宏观变化;第七章根据抽样调查,分析不同类型迁移人口与非迁移人口在竞争性劳动市场的就业和工作转换的;第八章是结论,分别对珠江三角洲人口承载力、劳动市场发展特征和趋势,产业结构调整 and 人力资源开发进行探讨。

本书可供从事人文地理、人口地理、社会经济、劳动市场与管理等方面的科研人员及高等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珠江三角洲人口迁移与劳动市场/李玲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港澳-珠江三角洲及其外围地区协调发展研究丛书)

ISBN 7-03-014987-4

I. 珠… II. 李… III. ①珠江三角洲—人口迁移—研究②珠江三角洲—劳动市场—研究 IV. ①C922.2②F249.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4690 号

责任编辑:朱海燕 吴三保 姚岁寒/责任校对:赵桂芬

责任印制:钱玉芬/封面设计:王 浩

科 学 出 版 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5 年 5 月第 一 版 开本:B5(720×1 000)

200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0 1/2

印数:1—2 000 字数:227 000

定价: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环伟))

总 序

珠江三角洲包括广东省七个省辖市和两个省辖市的八个区。土地面积 4.17 万 km^2 , 人口(按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计算)为 4077 万人(户籍人口 2307 万), 分别占广东省的 23.4% 和 47.18%。2001 年 GDP 为 8363.9 亿元, 占全省 78.6%, 占全国 8.1%; 人均 GDP 为 2.79 万元, 是全省平均水平的 2.16 倍, 约为全国水平的 4.53 倍。珠江三角洲是广东乃至全国经济最活跃和最具潜力的地区之一, 在全省、全国的经济地位仍在不断提高。若将港澳考虑在内的大珠江三角洲, 则土地面积 4.28 万 km^2 , 人口近 4754 万, GDP 为 2671.8 亿美元, 占全国 GDP 的 20% 左右。

改革开放以来, 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以及信息化的背景下, 珠江三角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979~1984 年是开始阶段, 1985~1992 年是快速发展阶段, 1993 年至今是稳步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初期, 受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的吸引, 香港大部分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转移到珠江三角洲, 先是组装, 后把与物流、质量控制、采购和包装等相关的活动也转移过来, 香港始终保持许多附加值最高的业务。珠江三角洲快速工业化。随着珠江三角洲的发展, 外资来源的多元化, 投资规模扩大, 跨国公司进入, 投资行业也迅速变化,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金属制造业等比重快速上升, 而传统的纺织、食品、机械、服装、玩具业大幅下降, 同时外资在服务业的投资逐步扩大。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 CEPA 的签订, 香港与珠江三角洲, 特别是与中心城市广州正在金融业、物流业、会展业、会计、法律及旅游业方面进行合作, 实现优势互补。通过二十年香港与珠江三角洲产业互动, 两地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1978~2000 年珠江三角洲一、二、三产业比重由 30%、47%、23%, 改变为 6%、50%、45%, 成为世界重要的制造业基地。而香港从 1980~2000 年, 则由 1.0%、31.7%、67.3% 转变为 0.1%、14.2%、85.7%, 80% 的制造业移到珠江三角洲, 而强化了香港经济中的生产性服务业的突出地位。

由于对外开放过程采用的是分地区推进的渐进模式, 初期港资主要

投入珠江三角洲,外围主要是通过大量劳动力涌入三角洲而增加外围的收入,外围与珠江三角洲的差距迅速拉大。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珠江三角洲劳动力、土地成本低的相对优势下降,产业升级扩散能力逐渐形成,加上政府的推动,外围的响应能力增强;到了20世纪90年代,港资开始进入珠江三角洲外围,三角洲的传统纺织、食品、玩具、机械等产业开始向外围扩散,外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三角洲与外围差距迅速扩大的势头趋缓。

经济的增长因素很多,有历史、自然、区位等等因素;但从根本上考察,主要是劳动力、物力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及制度因素。改革开放早期,在对外开放框架下,主要是劳动力和物力资本起作用。随着产业类型的变化,技术含量提高,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及制度因素便起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也就是说,早期是人流、资金流和物流的作用较大,而后期是知识创新、制度创新(信息流、技术流)显得更为重要一些。前期发展不同程度地伴生环境的破坏,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呈弱可持续性或不可持续性;后期则呈可持续性。

珠江三角洲的发展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早期外资规模小而分散,形成“群龙”四起的局面;香港辐射能力强,传统中心城市广州地位相对下降。后期,由于外资来源多元化,规模扩大,跨国公司进入,服务业开放,广州内生动力的崛起,中心地位提高;香港虽仍保持强大辐射力,但影响力相对略降。

香港的扩散能力远比澳门大,毗邻香港的深圳特区远比珠海特区发展得好,近邻香港的东莞远远超过了过去比东莞发展得要好的中山市。1980年深圳、东莞GDP与珠海、中山相当,2001年前者为2533.6亿元,后者为729.1亿元,出口额分别是56406亿美元、81.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分别为54.2亿美元、19.4亿美元。穗港深走廊成为发展的热点,穗珠(海)澳走廊差之甚远,形成了珠三角内部东西两岸的差异,因此修建伶仃洋大桥成了西岸发展的重要要素。

城市格局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表现。珠江三角洲北部的广州佛山,南部的港深、珠澳以现代化、综合性生产性服务业为主要城市功能,香港更多的面向东亚、面向世界,广州更多的面向本省、面向全国。中间,西起江门经中山、顺德、南沙到东莞、惠州,将成为世界级的制造业带。大珠江三角洲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成为一个整体,带动外围,辐射全国,影响世界,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将成为世界级的超巨型环珠江口城

市带。

回顾 20 多年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区域极化明显,贫富差距相对扩大,产业结构趋同,区域不良竞争明显,区域资源短缺,生态环境退化等。因而,港澳-珠江三角洲及其周围地区如何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充分发挥区域极化的扩散效应,走一条区域协调发展的道路,成为政府管理部门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预研究的基础上,1998 年 1 月,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提出“港澳-珠江三角洲及其外围地区协调发展的研究”项目申请。同年 9 月,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批准立项,该研究项目成为我国人文地理、城市地理界获得的第三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项目。2000 年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学部在中山大学召开了中期评估会议。参加本课题研究工作的先后共有 90 人,其中教授 8 人、副教授 13 人、讲师 9 人。经过三年多的努力,迄今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64 篇;出版学术专著 3 部,即将出版专著 7 部;完成博士后出站报告一本;完成博士学位论文 26 篇,待完成 4 篇;完成硕士学位论文 16 篇,待完成 3 篇。通过本课题研究,共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 1 人、博士研究生 35 人、硕士研究生 26 人。2003 年 12 月在北京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主持召开了该项目的结题验收会议。与会专家一致给该成果以较高评价,认为该项研究成果对港澳-珠江三角洲及其外围地区作为一个全球城市区域竞争战略的制定,资本、技术、人口流动,劳动力市场管理,城市与区域发展规划,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广东建设文化大省,港澳与珠江三角洲不同体制下的区域管理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指导和基础;认为该研究成果不但具有突出的学术研究价值,而且具有显著的实践指导意义。

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专著及负责人如下:

①许学强、顾朝林、杨开忠等,《港澳与珠江三角洲区域协调发展》(科学出版社,待出版);

②吕拉昌,《区域整合与发展》(科学出版社,2003);

③李红卫,《城市土地使用与管理——以广州市为例》(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

④李燕,《港澳与珠江三角洲文化透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⑤李玲,《珠江三角洲人口迁移与劳动市场》(科学出版社,2005);

⑥林琳,《骑楼广东》(科学出版社,2005);

⑦缪磊磊、许学强,《珠江三角洲及其外围地区知识和制度创新的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待出版);

⑧葛永军、许学强,《珠江三角洲及其外围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科学出版社,待出版);

⑨王欣、许学强,《珠江三角洲技术流——理论与实证》(科学出版社,待出版);

⑩段杰,《珠江三角洲产业集聚与专业镇发展》(科学出版社,待出版)。

本项研究是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同行们共同努力的成果,特别是作为课题的副组长顾朝林、杨开忠、闫小培教授及课题的秘书林琳(前期)、薛德升(中后期)副教授,为完成此项课题做了大量工作。特别还应该提出的是,在课题的选题、立项、申请和前期研究中,顾朝林、叶舜赞教授,在课题结题期间薛德升副教授做了十分有益的贡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从立项到出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学部的宋长青、冷疏影等领导和专家一直给予大力支持,多次亲临会议指导,为研究项目的完成起了重要作用。中国科学院陆大道院士、胡序威教授,北京大学周一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宁越敏教授,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余之祥教授、虞孝感教授,辽宁师范大学韩增林教授、冯仁国教授以及香港大学叶嘉安院士、朱剑如教授,在项目的选题、立项、中期评估、验收中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借此向以上所有的专家、同行和领导,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本研究成果,包括已出版的专著或即将出版的专著,已发表的或将发表的论文定有不少错误和不当之处,特别是“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之后,小珠江三角洲、大珠江三角洲、泛珠江三角洲的社会经济发展都十分迅速,本成果所涉及的内容一般都在2002年以前,不妥之处请多多批评指正。

许学强

2004年3月于广州

前 言

人口迁移存在于任何时期、任何社会,但导致人口迁移的原因、迁移规模、迁移方式,对迁出、迁入地的影响,以及移民融入迁入地社会的方式和程度等,不仅与区域本身的空间尺度、内部差异程度,以及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社会制度、历史与文化背景等密切相关,而且与在经济国际化、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及世界城市体系格局演变过程中区域所承担的分工、区域中心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所处的层次、区域同腹地的分工合作和资源流动程度等密切相关。

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国内各大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差异显著的国家,并且是将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从传统的农业国转变为初步工业化的国家。从整体来看,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有少部分地区已进入工业化加速期,部分大都市区在经历了工业化高潮期后正在进入第二、第三产业并重共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工业化成熟期,但大部分地区仍以农村经济为主,大部分人仍生活在农村。区域间如此巨大的差异,必然导致劳动力资源从投资回报率低的地区向投资回报率高的地区迁移。从这个角度来看,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与世界上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国家是相近的;但我国巨大的人口规模、悠久的历史所累积的区域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却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这又使中国的人口迁移具有独特性。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计划迁移机制与自发迁移机制同时运行,形成多元化的迁移系统,这在世界上也是独具特色的,从而使影响中国人口迁移的因素也比其他国家更为复杂。

与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和辽中南城市群相比较,珠江三角洲原有社会经济基础薄弱。但作为我国最早开始改革开放的地区,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综合试验区,珠江三角洲充分利用优越的区位条件,以工业化和国际化为先导,带动城市化和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综合发展,成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也因此成为对迁移人口最具吸引力的地区。为减缓 20 世纪 80 年代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扩大速度,20 世纪 90 年代改革开放逐步从沿海向内地扩展,加之上海浦东开发区的崛

起等,从而导致在 90 年代后半期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广东省经济发展速度低于东部和中部一些省市。虽然如此,但还是有更大比例的跨省迁移流动人口来到广东,使广东人口的增长速度高居全国首位,并显著高于那些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广东的省市。进入广东的迁移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再加上来自广东省内其他地区的迁移流动人口,以致除户籍迁移人口外,暂住人口已占珠江三角洲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外来劳动力已占在业人员的五分之三以上,如此高的迁移流动人口聚集度在全国实为罕见。

广州既是珠江三角洲的核心城市,广东、华南的区域中心城市,也是目前经济实力位于北京、上海之后居全国第三的特大城市。广州迁移流动人口相当于户籍人口的比重,虽低于珠江三角洲内圈层其他市,却显著高于北京和上海。由于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等各方面的差异,迁移流动人口对广州社会经济的影响也独具特色。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国适龄劳动人口约 8.5 亿,比西方国家的全部就业人口还多 3 亿多;农村人口逾 7 亿,除 1.4 亿迁移流动人口、其中近 9000 万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外,还有约 1.5 亿到 2 亿剩余劳动力。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是必然趋势。以全国最大人口迁入地——珠江三角洲及其中心城市广州为例,深入研究现阶段我国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间的关系,研究人口迁入地何以能够吸纳如此众多的迁移人口,大量人口迁入对迁入地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劳动力市场发展,以及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变化的影响等,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人口迁移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相似的发展规律,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又各具各自特征。本书在第一章界定人口迁移的概念与分类,回顾西方国家学者在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人口迁移的研究,以及国内外学者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迁移的研究。第二章回顾我国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类型的人口迁移,以及对珠江三角洲人口迁移和社会经济发展历程的影响。第三章分析珠江三角洲人口迁移特征,以及迁移人口对珠江三角洲人口发展的影响。第四章分析珠江三角洲人口迁移机制及其发展变化,着重于分析制度因素和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以及相对于全国人口迁移机制的独特性。第五章分析人口迁移对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与周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变化,以及对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第六章从劳动生产率在三大产业整体、

产业之间及产业内部差异、空间差异的角度,分析珠江三角洲产业结构转变中的第二产业过度扩张,以及宏观劳动市场的变化。第七章以广州为例,以抽样调查资料为主,分析不同类型迁移人口与非迁移人口在竞争性劳动市场的就业与工作转换。第八章是结论与探讨,分别就珠江三角洲人口承载力、劳动市场发展特征和趋势、产业结构调整 and 人力资源开发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图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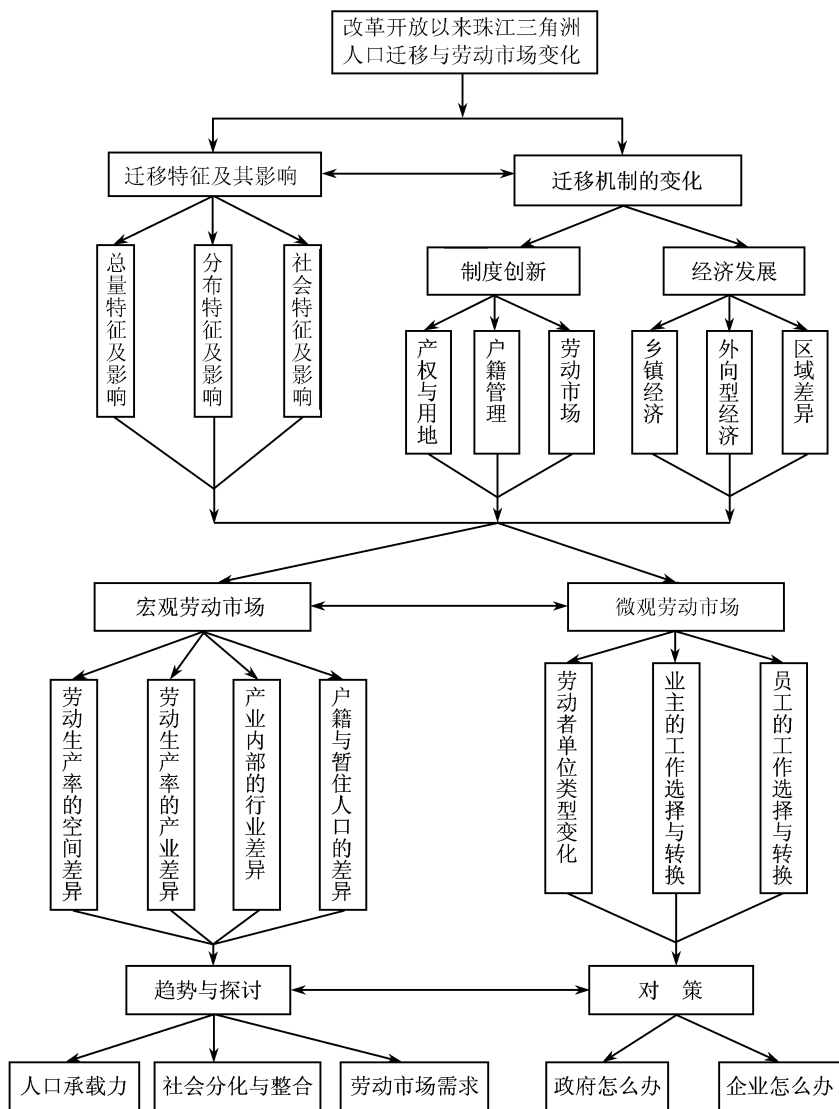


图 I 珠江三角洲人口迁移与劳动市场研究框图

本书主要运用统计年鉴和人口普查资料。统计年鉴的迁移人口指户籍人口及其迁移,人口普查的迁移人口包括户籍迁移人口和暂住人口。但统计年鉴的迁移人口,只区分了省际、市际迁移,没有具体的迁入人口来源地和迁出人口目的地。人口普查的迁移人口,只有以省、直辖市、自治区为整体的迁入人口来源地和迁出人口目的地,没有以市或县为单位的迁入人口来源地和迁出人口目的地。因而,本书以省内外人口向珠江三角洲迁移及对珠江三角洲经济与人口发展影响的研究为主,较少涉及珠江三角洲内部的人口迁移。除了统计年鉴和人口普查资料,本书的辅助资料还有:参加广东省建设厅 2001 年组织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深化)”、2002 年组织的“广东省城镇体系规划”,以及国家建设部和广东省建设厅 2003 年组织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协调发展研究”等研究课题时,在珠江三角洲各市调查访谈的资料和部分专题研究的资料;参加广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2000~2001 年组织的“加强广州城乡结合部管理”课题时收集的相关资料;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系的范芝芬教授合作,为她负责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和鲁斯基金“中国人口迁移与劳动力市场”研究项目,1998 年在广州进行的 1516 份抽样调查资料和其他一些个例调查资料。对在调查和收集资料过程中提供帮助的机构和个人,本人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目 录

总序	
前言	
第一章 人口迁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	1
第一节 人口迁移的概念和分类	1
一、人口迁移的概念	1
二、人口迁移的分类	1
三、本书所述的人口迁移概念和分类	2
第二节 国外关于人口迁移与发展研究进展	3
一、人口迁移的规律性研究	3
二、人口迁移与城市发展关系的研究	5
三、人口迁移与经济结构、劳动市场等相关因素的研究	8
四、对国外人口迁移与发展研究的评论	13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国内人口迁移研究进展	14
一、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迁移进程的变化	15
二、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和迁移选择、迁移方式	17
三、人口迁移与城市化	19
四、对珠江三角洲人口迁移的研究	21
五、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人口迁移研究的评论	22
第四节 国内外人口迁移研究的启示	23
第二章 珠江三角洲——迁移者的热土	24
第一节 人口压力流动律与我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	24
第二节 珠江三角洲历史上的人口迁移	25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人口迁移特征及其影响	28
第一节 迁移人口总量特征及其影响	28
一、迁移人口总量特征及对总人口增长的影响	28
二、迁移人口来源地特征及其影响	31
第二节 迁移集聚对珠江三角洲人口分布变化的影响	37
一、使人口高度集聚区从内圈层北部向东南部扩展	37
二、促进了城镇体系的发展	40
三、加快了大都市内部人口分布的变化	42
四、促进了以小城镇发展为主的区域性城市化发展	43

五、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44
六、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与经济结构的转变基本同步	47
第三节 迁移集聚对人口主要特征的影响	49
一、以初中程度为主,延缓了受高等教育比重的提高速度	50
二、以青壮年为主,延缓了人口老龄化进程	55
三、女性比例较高,降低了总人口性别比	57
第四节 小结	60
第四章 珠江三角洲人口迁移机制	62
第一节 制度创新的影响	62
一、产权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和用地制度的变化	63
二、劳动市场用工制度变化	65
三、制度变化导致的人口迁移类型变化	68
第二节 经济发展的影响	71
一、内源性经济发展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71
二、外向型经济发展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73
第三节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变化的影响	75
一、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变化	75
二、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变化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77
第四节 小结	80
第五章 珠江三角洲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变化的影响	82
第一节 人口迁移对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82
第二节 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变化的影响	83
一、人口迁移对国民收入转移的影响	84
二、迁移者自身的改变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影响	84
第三节 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影响	85
一、珠江三角洲与外围地区经济总量差异的变化	85
二、珠江三角洲与外围地区经济人均量差异的变化	88
第四节 小结	90
第六章 珠江三角洲产业结构转变与劳动市场的宏观变化	92
第一节 珠江三角洲产业结构转换中的第二产业过度扩张	92
一、产业结构转换的一般规律和例外	92
二、珠江三角洲第二产业的过度扩张	94
第二节 珠江三角洲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97
一、劳动生产率水平较高	97
二、比较劳动生产率变化显著,第二产业过度扩张	98
三、各市劳动生产率水平和比较劳动生产率差异显著	100

第三节	三大产业内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102
一、	林业畜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显著高于渔业种植业	103
二、	工业主导行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变化	104
三、	服务业主要行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异	108
第四节	小结	109
第七章	珠江三角洲劳动市场的微观变化	111
第一节	就业者工作单位经济类型的转变	112
一、	劳动市场分隔及变化	112
二、	受访者工作单位类型变化	113
第二节	业主和个人就业者的工作选择与转换	114
一、	居住身份与工作转换及业主类型的关系	114
二、	影响选择与转换工作的主要因素	116
三、	不同居住身份业主的差异	116
第三节	员工的工作选择与转换	118
一、	工作转换频率及主要影响因素	118
二、	不同居住身份员工的差异	119
第四节	小结	120
第八章	珠江三角洲人口迁移和劳动市场总体趋势及其对策探讨	121
第一节	珠江三角洲人口迁移的总体趋势及其显著影响	121
一、	大规模人口迁入显著影响了珠江三角洲人口发展	121
二、	劳动密集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力	122
三、	人口迁移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有显著影响	122
四、	促进了珠江三角洲竞争性劳动市场的发展	123
第二节	珠江三角洲人口容量现状与发展潜力的探讨	123
一、	人口规模迅速扩大的压力	124
二、	从世界大都市圈人口构成看珠江三角洲的人口容量	125
三、	从土地和水资源利用状况探讨珠江三角洲的人口容量	128
四、	从相对指标探讨的珠江三角洲经济人口容量	130
五、	珠江三角洲人口容量的综合探讨	131
第三节	珠江三角洲劳动市场特征与发展趋势的探讨	133
一、	劳动市场结构改变与缩小市场分隔的压力	133
二、	劳动中介组织的发展与规范	134
三、	社会分化的加大	135
第四节	珠江三角洲产业结构调整与人力资源开发趋势的探讨	136
一、	兼顾高新技术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136
二、	人力资源开发对策	138
参考文献		142
后记		152

第一章 人口迁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

人口迁移变动与人口自然变动、社会变动一起构成人口的三大变动。其中,人口迁移变动与人口自然变动又是影响人口时空分布的两大主要因素。而且,相对于变化较迟缓的人口自然变动,人口迁移变动的影响更为显著。人口迁移也就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第一节 人口迁移的概念和分类

一、人口迁移的概念

在人口的三大变动中,对人口迁移变动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人口迁移”的定义却不少。学者们从各自学科背景、研究角度和对象出发定义人口迁移,以致难以达成一个统一的定义。彭勋(1992)从人口迁移所具有的时间、空间、目的三大主要属性出发,将不同定义分为宽、中、窄三大派。宽派主要从空间属性来定义,着眼于人口的空间位移或地区、地域分布的变动。中派主要强调目的属性,认为迁移以定居或居住为目的。窄派则以三属性中的两或三个属性来共同界定人口迁移。可见,跨过较长距离、以较长期居住为目的向某地的迁移,是各种定义均认可的人口迁移。短期外出公务、务工、渡假、旅游、朝圣,或季节性、周期性、往返性的人口空间移动,在宽派来看或可属于人口迁移,而在中派和窄派来看就只能属于人口流动了。

人口迁移或流动中所涉及的人口就称为迁移人口或流动人口。

因而,人口迁移研究以迁移流动人口以及他们的迁移流动行为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包括:迁移者在各种内外因素影响下的迁移决策行为,迁移行为的实施方式和途径,迁移者融入迁入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式和程度,迁移人口和迁移行为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等。

二、人口迁移的分类

如同有多种定义一样,人口迁移也有多种分类。以下几种是常用的分类。

根据迁移人口所跨边界行政性质和等级的差异及城乡类型和规模的差异,人

口迁移可分为国际和国内迁移,国内迁移又分为省(州)际和省(州)内迁移,县、市际和县、市内迁移;城乡间迁移、城市间迁移、乡村间迁移以及不同规模城乡居民点间的迁移等。

根据历史实例和导致迁移的主要外部原因,彼得逊(1958)首先将人口迁移分为原始型、集团型、强迫型、推动型、自愿型等5种类型,再根据移民对迁移目的地选择的自由程度,以及对其在目的地生活方式的渴望水平或称迁移动机,将迁移分为保守型迁移和变革型迁移。保守型迁移指当原居住地环境发生改变时,为保持原生活方式而进行的迁移,其迁移动力主要来自迁出地的推力。变革性迁移是指将迁移作为一种获得更高目标的手段,且在迁移过程中不断改变其行为及生活方式,这类迁移多以城市为目的地,其迁移动力主要来自迁入地的拉力。这两种分类可以相互交叉。

根据人在生命周期不同年龄段的主要迁移动机而进行的分类,如库尔斯(1987)分类:16~20岁以学习为主要动机,21~34岁以工作岗位为主要动机,35~49岁以居住环境为主要动机,49岁以上以休息地为主要动机的迁移等。

三、本书所述的人口迁移概念和分类

我国公安户籍统计的迁移人口,则是指跨市县伴随有户籍变动的人口迁移。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不伴随户籍变动的人口迁移流动在总迁移人口中所占比重迅速提高,公安统计的迁移人口已无法反映我国人口迁移的真实情况。继1986年全国76城镇人口迁移专项抽样调查之后,1987年和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1990年第四次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四普”、“五普”),均有调查时点前5年内迁移人口的调查项目,包括户籍人口和暂住人口迁移,但对暂住人口的定义不同。“四普”指的是常住地发生跨市、县变动一年以上的人口;1987年和1995年抽样调查分别指常住地发生跨市、镇、县和市、县、区变动半年以上的人口;“五普”沿用1995年抽样调查的时间定义,区域范围缩小为街、乡,但以市、县为统计单元时,则调整为跨市、县迁移的人口。通常所说的迁移人口,既包括户籍迁移人口,也包括户籍未发生变动的暂住人口;在没有特指的情况下,流动人口往往既包括非居住目的、短期移动的人口,也包括居住目的、移动时间较长的暂住人口。

本书中户籍迁移人口、暂住人口分别采用上述公安统计定义和人口普查的定义,迁移人口包括户籍迁移人口和暂住人口,迁移流动人口包括户籍迁移人口、暂住人口及未达到人口普查暂住人口暂住时间期限的外出人口。迁移、流动人口的迁移过程就构成人口迁移、流动。

第二节 国外关于人口迁移与发展研究进展

早在 1889 年拉文斯坦就指出：“迁移意味着生存和进步，一个静止的人口就会停滞不前。”工业革命以来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主要是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使人类自身再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也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迁移既是这些变化得以发生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重要结果之一。国外对人口迁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迁移规律及迁移人口的社会特征，迁移进程与国家或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关系，迁移动机和影响迁移决策的主要因素等三方面。这三方面的研究内容互相包容，难以截然分开，且迁移对迁入、迁出地影响的研究也融合在其中。

一、人口迁移的规律性研究

除 E.G. 雷文斯坦在 19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人口迁移规律外，我国人口学家马侠(1992)将博格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Bogue 1959)提出的“推力-拉力”理论，及李在 20 世纪 60 年代(Lee 1966)提出的人口迁移理论也归入人口迁移规律。

1. 雷文斯坦迁移规律

德国学者 E.G. 雷文斯坦是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继 1876 年发表第一篇关于人口迁移规律的论文后，又在 1885 年提交英国皇家统计学会一篇《人口迁移规律》论文，利用英国 1871~1881 年人口普查资料研究人口迁移，驳斥了当时学术界一般认为“人口迁移无规律可言”的观点，将英国国内人口迁移归纳为 6 条规律，1889 年再发表论文，进一步根据 20 多个国家的统计资料提出 7 条人口迁移规律(Ravenstein 1876, 1885, 1889)。

雷文斯坦的人口迁移规律被不同的学者归纳为 5 条、7 条、10 条或 11 条(德伯里 1988; Waldo 1995; 马侠 1992)。这里将其归纳为 6 条：①迁移者的主体进行的是短距离的迁移；②一般的人口迁移所形成的迁移流指向具有吸引力的巨大工商业中心；尤其是长距离的迁移者，通常是优先选择迁入巨大的工商业中心。③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呈梯次逐级展开，城市吸收农村人口的过程，先是城市附近地区的农民向城市聚集，由此城市附近农村出现空缺，再由较远农村人口迁来填补，这种连锁影响逐次展开以致波及更远的农村。④迁移发生率与源地到目的地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即迁移的路程越长，移民的人数越少。⑤每个主要的迁移流会产生一个补偿性的逆迁移流，以致两地间的净迁移量在总迁移量中所占比例不大；逆迁移流具有与迁移流相似的梯次递进性和距离递减性特征。⑥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富有迁移性，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更富有迁移性。

2. E. 李的人口迁移理论

E. 李 1966 年在英国《人口学》杂志发表的《人口迁移理论》一文中,将迁移理论概括为三部分(Lee 1966,顾宝昌 1992)。

(1) 关于人口迁移量的规律。李认为影响人口迁移量大小的主要因素有:①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和自然地理环境条件的差异;②人口群体的差别,如青壮年比重重大的人口群体迁移量显然会较高;③影响迁移障碍因素的多少、大小,以及被解决的程度;④与经济的增长或衰退基本成正比;⑤迁移一旦开始,一般情况下,人口迁移量和迁移率总是与日俱增的。

(2) 关于迁移流和反迁移流的规律。①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称为迁移流,每一个大的迁移流,必会产生一个逆向迁移流;②如果迁出地对迁移流的影响主要是负因素,那么迁移流量较低;③中介障碍对迁移流有很大影响;④迁移流与经济的繁荣程度成正比。

(3) 关于迁移者特征的规律。李认为人们在审慎比较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各种条件后,作出迁移选择:①对于迁入地的各种正面因素或负面因素,迁移者作出主要是积极的或消极的选择;②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各方面的差距越大,吸引力也越大;迁移障碍越大,迁移者返回的比例越低;③迁移者在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迁移偏好,以年轻时期的迁移愿望最强烈。

3. 博格的“推力-拉力”理论

唐纳德·博格等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提出的“推力-拉力”理论着眼于人口迁移原因的研究,即迁出地的消极因素和迁入地的积极因素对迁移者的影响。他认为迁出地必有种种消极因素所形成的“推力”将当地居民推出原居住地,而迁入地必有种种积极因素所形成的“拉力”将其他地方的居民吸引进来。

形成“推力”的因素诸如当地的自然资源枯竭、农业生产成本不断增加、农村劳动力过剩导致的失业和半失业状况、较低的经济收入水平等。形成“拉力”的积极因素诸如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工作收入、较好的生活水平、较好的受教育机会、较好的文化设施和交通条件等。当然,迁出地对于迁出者也并非完全充满排斥力的消极因素,其中也有一些吸引人的积极因素,如家人团聚的欢乐、熟悉的社区环境、长期形成的社交网络等。同样,迁入地也并非完全充满吸引力的积极因素,其中也有一些排斥人的消极因素,如单身生活的烦恼、竞争激烈、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等。迁移者总是在迁出和迁入两地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利弊得失的权衡中,作出是否迁移的抉择。

4. 迁移规律适用性的变化

雷文斯坦所处的时期正是英格兰和多数欧洲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化上升的时

期,并且是以轻工业为主的工业化时期,人口迁移盛行,迁移者多是农村居民,女性迁移者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而 E. 李和博格的理论则形成于西方国家即将从工业化时期进入后工业化之时,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已基本结束,在人口迁移流向大城市的同时,从大城市向外的扩散流也同时存在。交通和通讯的发展使人们更容易获得关于迁入地的信息,也更容易克服各种迁移障碍。这些在工业化进程不同阶段归纳出的迁移规律,迄今仍被研究者们广泛引用。

与上述迁移规律有所不同的是,随着技术进步、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经济国际化所导致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的变化等,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虽仍存在递进现象,但越来越多的人直接迁入城市;以女性占优势的迁移流,除以近距离为主外,还发生在以轻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和以出口加工业为主的地区,或以自然农业为主的地区。迁移量的与日俱增,发生在城市化达到成熟期以前。“推力—拉力”虽形象地分析了引起人们迁移的动因,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并不是迁移者对推力—拉力进行权衡的结果,而主要是由于农业落后、贫穷和失业等推力作用而引起的。

二、人口迁移与城市发展关系的研究

1. 人口迁移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

扎林斯基(Zlinsky 1971)主要根据发达国家 20 世纪 70 年代前的人口迁移与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以及与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关系,提出“人口移动转变论”,将人口迁移进程分为五个阶段。①工业革命前传统社会阶段:高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缓慢,人口很少迁移流动;②工业革命早期社会转变阶段:伴随死亡率的下降,人口迅速增多,农村剩余人口增加,出现大规模由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同时在国内移民拓荒或殖民海外;③工业革命晚期社会转变阶段: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而抑制了人口自然增长,因移民海外而使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速度放慢;④发达社会阶段:低死亡率和低生育率,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速度较以前更低,然而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增强,来自欠发达国家的净迁入人口,以及因商业活动和旅游的周期性人口迁移增加;⑤未来超发达社会阶段:推测未来大多数居民迁移发生在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对于来自欠发达地区非技术工人的大量迁入,发达地区可能予以控制。

简言之,扎林斯基的“人口移动转变论”,将迁移进程分为五个阶段三大迁移流:工业革命前人口很少流动;工业革命早期到后期,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从主迁移流转变为非主迁移流;工业革命后期到发达和未来超发达社会阶段,城市间或城市内的迁移逐渐成为主迁移流;从工业革命时期到发达社会、未来超发达社会阶段,国际迁移流从向海外迁移转变为从海外迁入,再到控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口迁入。其理论与地理学家引用逻辑斯蒂曲线概括的城市化水平变化过程 S 形曲线

(Northam 1975),即一国或一地区在城市化初期、加速和后期阶段,城市人口比重增长速度的变化特征相比较,可说有异曲同工之处。

“人口移动转变论”是对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几种发展形态的归纳,这几种发展形态在发展过程中是否有着严格的先后次序,是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仍有待进一步研究验证。这一理论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在于,将人口迁移流动与人口转变,工业化及城市化过程结合起来,从更广阔的视角来分析人口的迁移及移动。

发达国家普遍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大都市中心区人口外迁后,70年代前半期开始出现人口从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向非大都市区(non-metropolitan area)的净迁移,使研究者开始探讨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趋势。80年代人口从非大都市区向大都市区的回流,又引发了对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进程的长期趋势(Mera 1988; Berry 1988, 1990,)还是短期现象(Cochrane, Vining 1988)的讨论。关注逆城市化的贝里(Berry 1970, 1976)考察了1790~1980年间,美国人口迁移波动与约50年为周期的经济长期波动、城市人口增长波动间的关系(Berry 1988),指出每一次经济增长波动,都引起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波动,使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并使城市化的逻辑斯蒂曲线产生二级波动或短期波动。认为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大都市区再复兴、从非大都市区向大都市区人口迁移的回升,只是城市化长期趋势中的短期波动,并非逆城市化趋势的结束。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美国再度出现人口从大都市向中小城市、向非大都市区的净迁移,进入21世纪初期则不仅人口重新向城市内迁移,而且出现了伴随人口回归的投资回归(Long, Nucci 1998; Manson, Groop 2000; 马强 2003),似乎也验证了贝里的观点。

盖耶和考特利(Geyer, Kontuly 1993)的城市发展循环假说认为,人口向不同规模城市的迁移集聚和扩散,导致大、中、小城市依次经历人口的快速和慢速增长,在向大城市迁移集聚的早期极化阶段之后,当人口开始向中等城市迁移集聚之时,也即开始出现从大城市迁出的早期扩散迹象之时;当人口开始向小城市迁移集聚之时,就是人口从大、中城市的迁出扩散成为主导迁移趋势之时,由此构成城市发展循环。不同规模城市依次进入集聚—扩散的阶段,又与城市发展的城市化、郊区化到逆城市化阶段相对应,而且随人口结构的转变、交通通讯的发展和城市发展水平的提高,每阶段的净移民强度逐渐减弱、所需时间逐渐缩短。

发达国家因人口净迁移方向变化,引起逆城市化、再城市化的转变,其主要原因可归为两方面。从经济发展和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来看,20世纪70年代受石油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缓慢,加上与高企的石油价格相伴的节能运动,延缓了居住郊区化的步伐。80年代中期以后,油价逐渐下调,90年代前半期稳定在较低价位。信息时代的来临,也使物质生产组合方式趋向分散化,办公与居住功能趋向融合,极大地缩小了工业时代大、小城市间在技术能力和信息易得性上的巨大差异(Berry 1990),这是逆城市化再度兴起的主要原因。

从人口结构的变化来看(Kontuly, Bierens 1990; Haas, Serow 1997),“二战”

后“婴儿爆炸”时期出生的一代人,较普遍地接受了高等教育后,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进入就业、成家的高峰期,他们对都市生活的追求,是大都市再发展的重要原因;部分早期迁出的高龄老年人,为接近保健机构而返回中心城市居住,也是大都市再发展的部分原因。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前出生的一代人在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前半期进入退休高潮,他们向非大都市区的净迁移,则是这时期再度逆城市化的部分原因。一些学者则将引起人们向非大都市区迁移的原因,归结为在经济部门结构变化及区域结构调整过程中,人们是选择就业-迁移还是选择居住-通勤的结果(Renkow, Hoover 2000)。

信息时代正日益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居住、工作、迁移及城市发展,“婴儿爆炸”时出生的一代人也开始进入以选择退休养老地为动机的迁移周期,他们的居住选择将对今后二三十年发达国家的人口迁移有重要影响。目前人们还难以确定逆城市化究竟是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长期趋势还是短期现象(Fuguitt, Beale 1996; Fery, Liaw 1998; Frey et al. 1998),是从工业社会的圈层式向信息社会网络式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过程中的过渡,还是从城市发展的第一循环进入第二循环的过渡。

2. 区域性劳动力国际迁移与经济国际化国际劳动地域分工及世界城市体系

技术进步,不仅加速了经济国际化和国际劳动地域分工格局转化的进程,也影响着不同地区的人口迁移。有学者认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劳动力区域性国际迁移,与 70 年代中期以前因经济增长与劳动市场需求导致的迁移明显不同(White 1986; Findlay 1996)。如西欧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初,主要因快速工业化所产生的需求,吸引了周边国家劳动力的大量迁入。80 年代以来,经济国际化、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灵活化、生产组织方式重组、人口结构变化和女性经济活动率提高等,使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下降,既使人口零增长或增长率很低的国家,也基本可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再加上文化的阻力,使 90 年代以来所接受的迁移人口趋于减少;来自外部因劳动供给压力的迁移,也面对这些国家日益强烈的反移民政策。

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寻求土地、原材料、劳动力和市场的竞争,不再是将原料和劳动力输入发达国家去加工产品,而是将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工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萨森等认为(Sassen 1988, 1991),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加速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进入世界市场的步伐,加剧了这些国家内部不同地区间劳动力供需的变化,引起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也加剧了这些国家城市现代经济与农村传统经济之间、城市正式经济与非正式经济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不同性别劳动力迁移和就业的变化(Portes, Walton 1981; Nash, Kelly 1983; Castells 1989; Brydon, Chant 1989; Maeesy et al. 1993; Lawson 1998)。

在国际资本参与下,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先后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劳动力国际迁移也发生了显著变

化(Albuero 1994; Fields 1994; Skeldon 1994; Hugo 1996; Kim 1996)。庞(Pang 1993)以 S 形曲线描述了这种变化:在经济未加速发展前,无明显的劳动力迁出或迁入,随着经济发展加速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和信息联系增强、人均收入提高、向国外的净迁移随之增加;经济继续快速增长,使留在国内的吸引力开始加强,到一定时期,净迁出率开始下降;当实现了工业化,则不仅能吸引在海外就业人员的回迁,对外籍劳工的吸引力也会增强。

经济国际化促进了世界城市体系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管理和控制职能主要集中在处于世界城市体系高层次的少数全球性城市,或区域性国际城市(Friedmann 1986; Castells 1989; Sassen 1991; Castells, Hall 1994; Knox 1996),菲利等认为(Findlay, et al.1996, 1998),世界范围的等级权利体系比区域经济因素对劳动力国际迁移的影响更大。国际城市主要吸引两类劳动力的迁入,一类是来自世界范围、高度熟练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以保证国际城市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密切联系;另一类是来自周边国家或地区、低收入的服务业劳动力,以满足高薪人士的多样化需求,保证国际城市的繁荣和竞争力。这也是 20 世纪 90 年代汉城、香港、新加坡等东亚、东南亚地区国际城市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原因(Findlay, Li 1999)。

三、人口迁移与经济结构、劳动市场等相关因素的研究

1. 人口迁移与经济结构、预期收入及分散家庭收入风险

1) 以托达罗为代表的迁移理论

该理论引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融合了发展经济学的两部门结构发展模式理论和预期收入理论等,认为区域经济发展及部门结构的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力供需的地区差异影响着人们向有较多就业机会,及预期收入较高的地区迁移(刘易斯 1984; 费景汉,拉尼斯 1989; Sjaastad 1962; Harris, Todaro 1970; Greenwood 1975; Todaro 1980; Guest 1989; 李竞能,吴国存 1993; 蔡昉 1998)。

(1) 刘易斯两部门劳动力转换理论:认为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经济部门之间由于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的差异,导致两部门之间的劳动力转换,从而引起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现代大工业吸收农村中的隐蔽性失业的过剩劳动力,方可使国民经济发展由停滞转变为稳定增长,从而摆脱贫困走上富裕道路(刘易斯 1984)。

(2) 费景汉-拉尼斯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三阶段理论:在刘易斯两部门理论的基础上,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分为三个阶段,分析了转变过程中的三大变化。农业部门从存在大量显性失业人口,到仍存在隐蔽性失业人口,到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农业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从几乎为零开始,逐渐提高到高于制度工资水平;在现代工业部门发展的同时,传统农业逐渐向商业性农业转换,经济开始

进入稳定增长的发达阶段(费景汉,拉尼斯 1989)。

(3) 托达罗预期收入理论:针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而城市经济无力为大多数人提供长期就业机会的现象,试图系统地阐述城乡劳动力迁移的经济行为模式,并将农村迁入人口就业的可能性与城市劳动力需求及供给因素的模式结合在一起。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决定因素,是城乡经济结构差异和对于迁移成本和效益的权衡,强调决定迁移的是城乡之间“预期收入”的差异,而不是实际收入的差异。因此,减少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成为潜在的失业大军和缩小城市传统部门规模的最为重要措施,是缩小城乡收入差别和改善乡村人民生活(Todaro 1970; 1980)。

有些经济学者认为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式是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模拟的,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国际学术界对托达罗模式亦褒贬不一,持否定态度的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农民未进入城市之前,对城市的信息并不完全了解,他们的迁移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但工农业两个生产部门或城乡两种经济的结构差异导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进入工业部门的前提条件,入城农民往往先进入城市传统部门,然后进入现代部门就业的观点,以及缩小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以减少农村劳动力迁入城市等是有学术价值的观点,对研究我国城乡人口迁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马侠 1992)。

2) 以贝克尔和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效益”理论

该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影响人们迁移的最重要因素是迁移所带来的,可以提高迁移者个人或家庭收益的各种新机遇(Wood 1981; Clay, Schwarzweller 1991)。舒尔茨将用于迁移和用于受教育的费用都看作是能够获得更大收益的投资。斯达科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和贝克尔的“成本-效益”理论用于解释迁移的动因,认为人们迁移的花费是投资成本,迁移后的所得是效益利润,因此迁移行为的选择取决于迁入地的平均收入是否超过迁出地的平均收入加上迁移过程的费用(斯达科 1982;舒尔茨 1984;Becker 1975; Rosen 1977)。

迁移过程中的投资、代价包括各种花费,体力消耗,原居住地各种可能机会的丧失,新生活环境所引起的孤独和离异等心理代价。迁移后的利润包括可能增加的收入,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多的就业、升学机会等。这一理论解释了为什么迁移活动会随着年龄增加而递减的现象。青年人更愿意迁移是因为他们在迁出地还未立足,没有多少损失,而迁移中的困难对青年人也较容易克服,迁移后更易于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即青年人在迁移过程中的投资和代价较小,迁移后有较长的工作时间,获得利润和好处的可能性更大,因此青年人更倾向于迁移。

总之,迁移既是人力资本投资,也是使迁移者的人力资本存量获得更好回报的途径之一。由于从资本充足区向缺乏区的流动,有可能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投资回报率,因而,高技术劳动力向人力资本缺乏地区的迁移,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

(Massey et al.1993)。

3) 以斯达克为代表的新经济学和家庭决策理论

该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迁移多数是家庭或家族决策的结果,迁移有希望达到家庭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双重目标(Stark, Levhari 1982; Stark 1984, 1991; Stark, Bloom 1985; Katz, Stark 1986; Tarloy 1986; Lauby, Stark 1988)。区域间的收入差异是人口迁移的前提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即使区际收入差异缩小,但其他市场没有得到有效发展,农村人口仍会外迁。如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保险、信贷、期货市场不发达,没有完善的农产品最低价格保护政策,农户难以获得信贷和农作物收成保险,农产品加工体系不发达,农户很少在播种季节前获得购销期货合同,农民就业不足且没有失业保险,仅靠农业生产难以获得较稳定的收入。家庭部分成员迁出,可分散农业收入不稳定的风险。迁出者向家乡的汇款,既有利于克服风险,也对经济活动和收入分配有积极影响(Lucas 1987; Taylor 1992),但一定数量的汇款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作用和意义是不同的。当地区经济发展使平均收入水平提高,但相对贫困的家庭未分享到收入的相应提高时,会促使迁移量提高;当相对富裕的家庭未分享到收入的相应提高时,会减少迁移量(Stark et al. 1986; Stark, Yitzhaki 1988; Stark, Taylor 1989, 1991; Stark 1991; Massey et al.1993)。

4) 吉萨克和马克的实证研究

吉萨克对美国 1965~1986 年期间 181 个基本经济区的人口净迁入率与就业机会增长、收入、投资、当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生活质量等变量间的关系进行了多元相关分析,认为影响人口净迁入的最重要因素是就业机会的增长(Jinsuk 1996)。马克分析了 1981~1991 年,美国 48 个州不同产业部门的就业增长对提高当地居民就业率与吸引新移民间的关系,认为由于劳动者在不同产业部门间就业转换的成本要高于在同类产业部门内的转换,因而,非竞争性的就业增长(即就业增长率空间分布较均衡的产业部门),将有利于提高当地居民的就业率,所吸引的人口净迁入量较小;而在某些地区的竞争性就业增长(即就业机会空间分布不均衡的产业部门),对提高当地居民就业率的作用较小,而且会引起该类产业就业人员的净迁入(Mark 1999)。

根据上述理论,研究者认为,政府不仅可以通过制定控制和影响迁入、迁出地劳动市场的政策来影响人口迁移;也可通过制定控制和影响不同层次劳动力市场的政策,使欠缺高技术劳动力的国家或地区有可能引入熟练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政府还可通过制定调节收入分配、促进保险、信贷、期货等金融市场发展,尤其是失业保险市场发展的政策来影响人口迁移(Maesey et al.1993)。

2. 人口迁移与二元劳动市场、网络关系、累积效应

结构主义认为国家或区域经济的历史性转变,与其相关的资本扩张和生产空间组织方式的转变等,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社会制度、机构及其运作方式的转变,影响着人口结构、区域经济发展、部门结构差异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伍德等认为这些变化及社会文化的地区差异与变化,对人口迁移都有不同程度影响(Wood 1981; Guest 1989; Massey 1990; Goldscheider 1992)。

1) 以鲍尔(Piore 1979)为代表的二元劳动市场理论

二元劳动市场理论认为,一方面,工业社会的结构性工资反映了劳动者的职业阶层和社会地位,各层次工资的提高有联动效应,不能仅以提高最低层次工种的报酬来吸引本地人,本地人也不愿从事这些低收入、低社会地位的工作。而移民,尤其是来自低收入国家或地区、受教育少的新移民,仅将工作看作获得收入的手段,无法介意其所内涵的社会地位意义。而且,也许这很低的收入也高于其在家乡所可能获得的收入。作为家乡社区的一员,其给家乡的汇款,可巩固或提高其本人或家庭在家乡社区的收入地位和社会地位。

另一方面,工业经济资本的二元属性,使作为可变要素的劳动者,在需求不足时是首先被释放的生产要素。由于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的高技术劳动者、管理者需求相对稳定,且通常有工会和劳动合同的保护,被释放成本较高;劳动密集型生产部门的低技术劳动者,则被释放成本很低或几乎不需成本。

因而,劳动市场的工作一般可分为两类,在主导部分(the primary sector)或正式部门(formal sector)就业的人受教育程度高、收入高、福利待遇好;非主导部分(the secondary sector)或非正式部门(unformal sector)以低工资、非稳定性工作、缺少合理的提升机会为特征,主要招收非熟练劳动力(Dickens, Lang 1988; Lang, Dickens 1988)。过去在发达国家非主导劳动市场就业的主要是妇女、青少年和少数族裔,随着出生率下降、教育发展、女性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本地人逐渐退出这类市场,替代为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在发展中国家非主导劳动市场就业的主要是农村来到城市的移民。某些工作因主要由移民承担,累积效应使人们在心理上将这类工作贴上移民工作的标签,认为这些是地位较低的工作,使非移民不再愿意承担这类工作(Bohning 1972; Piore 1979; Massey 1990)。因而,人口迁移不是迁出地的推力作用,而是迁入地的拉力作用(长期不可避免的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而产生的(Piore 1979)。

后工业社会、知识经济社会劳动市场的二元化,也产生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就业结构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及服务业内部的两极分化。工业生产的加工环节从发达国家向外转移扩散,使传统有工会组织的技术工人、中等收入层所占比重日趋下降。从事产品研究开发、生产组织、市场开拓和组织的、熟练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

理人员的比重迅速提高,为满足这些高新人士的需求,就业于传统服务业的低技术、低收入劳动力的比重也相应提高,移民是后一类劳动力的主要补给者(Goe 1990; Scott 1990, 1993; Scott, Soja 1996; Daniels 1993)。

2) 以马希为代表的移民关系网络和累积效应理论

移民关系网络理论认为,新老移民之间、迁出地与迁入地居民之间,由亲朋或同乡关系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是种社会资本,其建立和扩张有助于降低迁移成本和迁移风险,提高迁移的可能性。通过关系网络的迁移,又称为移民自组织的迁移。迁移量的逐渐增加,不仅使网络得到进一步拓展,对迁出、迁入地的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Massey 1990; Hugo 1981; Taylor 1986; Gurak, Caces 1992)。

从社区层次来看,累积效应容易使已有很多人迁出、迁入的社区形成移民文化。如从迁出地来看,一些家庭通过劳动力外出增加了收入,会激发其他较低收入家庭成员的迁出,进而影响收入差距的变化。青壮年人口的较多迁出,使未迁出的年轻人容易被认为是懒惰、缺乏活力、没有抱负(Reichert 1982),使更多青年人循着已形成的迁移途径外出;迁出者向家乡的汇款、返乡探亲时带回的异乡文化等,也对社区原有经济、文化生活有一定的累积影响。在迁入地,某些来源地移民的较多聚集,有利于吸引来自该来源地的新移民,甚至形成不同来源地的移民文化岛。

总之,一旦人口开始迁移,政府就很难控制,迁出地与迁入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均随之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累积效应的反馈机制和移民关系网络的形成在政府的控制之外,而且能产生于任何社会制度之下。无论工作性质如何,只要有越来越多的移民从事,该种工作就会被标上“移民”的标签。在一定时期内,减少或限制移民迁入,让本地人重新从事这些“移民”工作,以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很难实行。因为本地人的观念已发生了变化,结果是更多的移民被雇用(Massey et al. 1993)。

3. 人口迁移的性别差异、居住和就业分异

20世纪70年代再度兴起的女权主义(feminism)研究,在80年代到90年代先后转为女性(women)和性别差异(gender)研究。随着用词的转变,研究重点也从描述两性不平等在社会和地理空间的表现,转为研究产生性别差异的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各方面原因。在人口迁移方面则强调从性别差异的角度,对比研究上述原因对男性和女性在何时、因何迁移,及迁移结果的差异;从国家及区域经济历史性转化的角度解释女性人口迁移,以及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文化的性别差异对女性迁移的影响;从不同家庭成员所承担的生产和再生产角色对迁移的影响,如由于男性外出谋生,使“单身母亲”家庭的比重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责任加重等(Radcliffe, 1991; White, Jacson 1995; Lawson 1998, 2000; Silvey)。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剧,使迁移人口日益成为人口增长和新增劳动供给的主要来源。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也强化了这些国家,特别是作为主要迁入地的大都

市的人口构成、劳动市场构成以及社会居住空间的种族、民族、性别、阶层分异(Scott, Soja 1996; Park 1998; Wong 1998; Zelinsky 1998; New bold 1999; Ellis, Wright 1999; Mattingly 1999; Ley 1999; Partridge 1999; Gober 2000)。

四、对国外人口迁移与发展研究的评论

西方国家对人口迁移的研究已从 19 世纪 80 年代从人口迁移距离和流向、迁移者的某些特征来探讨人口迁移规律,发展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将人口迁移流动与社会经济现代化、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相联系,探讨不同时期人口迁移的规律或特征,再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将人口迁移与经济国际化相联系,探讨生产组织方式、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和世界城市体系的发展变化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从分析迁移者特征和迁出迁入地的推力-拉力对人口迁移的作用,深入到分析社会和劳动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各类市场的发展、人力资本投资、移民关系网络、累积效应及性别差异等对人口迁移的影响。这说明不仅影响人口迁移的内外因素日益复杂化、多样化,人口迁移对迁出、迁入地的影响也日益复杂化、多样化(表 1.1)。

表 1.1 西方人口迁移研究进展简表

19 世纪 70~80 年代	20 世纪 50~70 年代	20 世纪 80~90 年代
人口迁移规律 雷文斯坦:距离、流量、流向、动机、迁移者特征	博格:推力—拉力 E. 李:迁移量、生命周期	
迁移与工业化城市化	扎林斯基:迁移与社会转变 贝里:迁移与经济增长和城市人口增长波动 盖耶,考特利:迁移与城市发展循环	萨森: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 菲利:迁移与世界城市
迁移动机和迁移决策	托达罗:新古典经济学 贝克尔,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	斯达克:新经济学 鲍尔:二元劳动市场 马希:关系网络、累积效应 结构主义、性别差异

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人力资本、新经济学、移民关系网络、累积效应和性别差异理论,主要是微观的从迁移者角度,分析经济和社会环境因素对迁移决策的影响。那么,结构主义、二元劳动市场理论和人口迁移与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经济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关系,则从宏观层次分析长期趋势及地区、国家、国际不同范围的结构变化对人口迁移的影响。而人口迁移规律则从宏观和微观层次分析迁入地

和迁出地之间的迁移距离、流量、流向、推力-拉力, 迁移者的差别迁移特征等。

这些从宏观、微观等不同层次对人口迁移的研究, 主要是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 通过对不同区域、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人口迁移的分析, 归纳出人口迁移的一般规律, 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各种理论又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解析相似区域在相似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下、不同类型人口迁移的迁移动机和迁移规律及与其他环境要素的关系。

随着 20 世纪中期以来世界范围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经济现代化和人口转化进程的加速, 关于人口迁移的理论也日益丰富, 某些规律得到越来越多研究例证的支持或质疑。虽然千差万别的区域差异, 使主要基于对发达国家人口迁移研究而归纳的理论和基本规律, 难以普遍适用于目前世界上处于经济发展、人口转变和城市化进程不同阶段的国家或地区, 且多数研究是基于某种理论, 而综合分析不足。但不同理论和某些基本规律不仅为不同区域人口迁移的多角度研究提供了指导或切入点, 也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如区域间的收入差异是人口迁移的前提条件, 但不是必要条件, 影响人口迁移的最重要因素是就业机会的增长。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控制和影响迁入地、迁出地不同层次劳动力市场的政策、规范劳动中介市场和促进金融保险市场发展的政策, 以及调节收入分配、鼓励多元文化发展等手段来影响不同类型人口的迁移, 促进迁移人口与迁入地社会的融合。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国内人口迁移研究进展

转型期社会经济结构和户籍管理制度发展变化、文化传统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等, 使中国人口迁移具有独特性。本节主要从地理学和人口学的角度, 从人口迁移进程的变化、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和方式、人口迁移与城市化、人口迁移与性别差异、迁移人口对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及影响等方面, 评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人口迁移的研究(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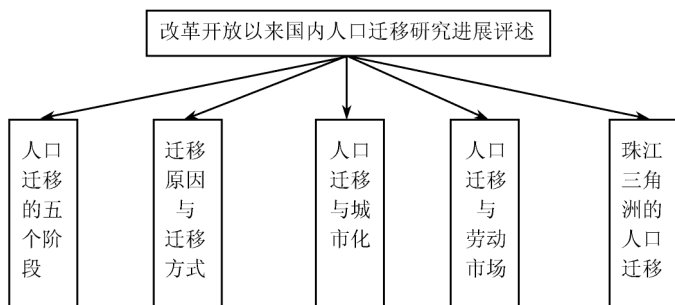


图 1.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迁移研究评述结构框图

一、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迁移进程的变化

1. 迁移流向及迁移类型的发展变化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以来,户籍制度一直是影响人口迁移量、迁移流向及在迁入地居住身份的重要因素(彭勋 1992;杨云彦 1994;吕昭河 1999;Christiansen 1990;Cheng 1991;Chan R.1992;Goldstein, Goldstein 1994;Cheng, Mark 1994)。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对人口迁移流动管理制度和调控措施的变化,人口迁移规模迅速扩大,宏观迁移流向发生逆转。从延续数百年的向北、向西开发自然资源富集区、边疆地区、人口稀疏地区的迁移流,转变为向东部沿海地区(蔡建明 1990;于蜀,张茂林 1998)或东南沿海地区的迁移流(张善余 1990,1992;杨云彦 1992 a)。国内宏观迁移流向再次与中国人口史上国内、国际人口迁移流动从西北入境、缓缓移向东南,再从东南部出境的长期历史趋势(赵文林 1985)相吻合。

2. 人口迁移的阶段划分

根据迁移规模、增长速度、时空距离的变化,杨子慧、萧振禹(1996),王立英(1996)等将我国改革开放至 1995 年人口迁移流动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1978~1983,1984~1988,1989~1990/1991,1990/1991~1995 年),赵树凯结合流动人口对社会的影响,也将这一历程分为四个阶段¹⁾(1978~1984,1985~1988,1989~1994,1995~),再结合对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管理制度、调控措施的发展变化,以及近几年的发展,笔者采取五阶段划分:

第一阶段,1978~1983 年:改革开放后逐渐推广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使长期存在,且日益沉重的剩余劳动力压力开始释放,但因自由流动的意识还未充分觉醒,而且城市体制变动晚于农村,吸纳就业的空间有限,因此,人口迁移流动的规模小、增速慢,并以短期、短距离迁移为主。

第二阶段,1984~1988 年:国家开始放宽对人口迁移的制度限制,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在小城镇落户,鼓励乡镇企业的发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逐步展开。由此激发了人口自发迁移流,迁移流动规模迅速扩大,远距离迁移大范围展开。但因农村非农产业、城市和沿海地区吸纳能力较强,流动人口与流入地的吸纳能力间未表现出强烈的不协调,流入地尚未感到强烈的多方位冲击。继 1985 年北京市首次进行流动人口综合调查后,1986 年起全国各大城市建立了流动人口日常统计制度。

1) 赵树凯,1998、1997 年的农民流动:新阶段新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

第三阶段,1989~1995年:流动人口规模迅速增长,年增长速度多在10%以上,高时达20%以上。其中1989~1991年,宏观经济治理整顿抑制了城乡就业增长,城市清退的农民工辗转其他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寻求就业机会,使远距离迁移规模迅速扩张,并与交通运输能力及流入地的吸纳能力间产生了强烈的不协调,1989年首次爆发“民工潮”,使社会受到强烈的多方位冲击。1992~1993年,改革开放步伐和经济市场化进程骤然加快,就业需求大增,拉动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针对高涨的“民工潮”,潮头涌入的闸口部位率先开始采取措施规范引导潮涌。如广东1991年开始实施“治潮工程”,先后与民工八个主要来源省区建立劳务协作关系,建立了华南劳动力市场信息网,实行对外来工管理的“证卡合一”制度。1994年底起,一系列旨在抑制劳动力盲目外出的全国性规定和措施相继出台。

第四阶段,1996~2000年:流动人口规模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在较大的总量规模上运行(徐伟1999)。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农业政策的调整,提高了农产品的比较收益,使农业对劳动力的吸聚力增强。改革开放向内地的扩展,促进了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转移。对外开放、与沿海地区企业合作、部分早期外出务工经商者的返乡创业等,也增加了内地经济发展的机遇和就业市场的容量(杜守东1997;张善余,杨晓勇1996)。另一方面,在城市经济结构中,外来人口经过十几年的拼搏,他们所可以开辟并占领的剩余就业空间日趋减小。加上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我国城市经济运营难度增加、企业效益下降。而国有企业改制步伐的加快,又使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增加。为保城市“再就业工程”的实施,一些大中城市先后实施招收外来工的职业或工种准入制,抑制对外来劳动力的吸纳。1996年开始实施“农村劳动力有序化转移工程”,建立了以京、沪、粤为中心,联结21省市区的华南、华东、华北三大区域劳动力市场信息网,再与其他省先后连通;在城市中落实流动人口就业登记管理制度,加强对流动人口的调控管理。城市的就业限制、外来工办理各种证件所需的费用,及伴随铁路提速的票价上调等,使外出成本增加,也作用于减少农村劳动力的盲目外出(杜守东1997;李玲1999)。

第五阶段,2001年以来:人口迁移流动又逐渐加速。进入21世纪,我国相继实施了开发西部地区、振兴东北的宏观区域发展战略,促进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经济的互补性增长和共同发展。而且,我国也已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人口大规模迁移流动是这一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西部地区原来对劳动力输出不够重视的省份(如陕西),也开始将劳动力输出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而大力促进。为降低人口迁移流动成本,减少人才迁移流动的障碍,从2001年开始,全国各地相继开始停止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统计分类,代之以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统计,同时将户籍人口迁移的限额制改为准入制,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城市、城镇根据各地情况,设立了不同标准的准入门槛,对急需人才则大幅降低准入门槛。

2003 年末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之后,我国又开始致力于打通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劳动就业市场,以促进人才交流、流动。为稳定农业发展,我国在 2004 年初宣布,开始在不同类型地区取消或在几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而且,为降低大规模的人口跨省市迁移流动,对不同区域间人均经济指标比较的影响,国家统计局决定,从 2004 年起,将以人口统计中的常住人口计算各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一系列的举措,均显著影响着我国人口的迁移流动。

3. 人口迁移、流动量的变化

据 1990 年“四普”和 1987 年、199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我国迁移人口规模 1982~1987 年为 3053.3 万,1985~1990 年为 3412.8 万,1990~1995 年为 3642.6 万;1985~1990 年和 1990~1995 年的迁移人口分别相当于 1990 年、1995 年全国总人口的 3.01%和 3.02%(于蜀,张茂林 1998;王桂新 2000);暂住人口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比率从 1982 年的 0.7%,上升到 1990 年和 1995 年的 1.9%和 2.4%(严善平 1998)。

全国流动人口总量,估计 1982 年约 3000 万,1985 年约 4000 万(张庆五 1986),据 1992 年“计划生育管理信息系统首次调查”结果推测为 9360 万(杨子慧,萧振禹 1996)。90 年代中期的流动人口规模一般推测为 8000 万左右,其中在公安部门登记的有 4400 万,跨省流动的约 3000 万(李荣时 1996 a,b;人口研究编辑部 1997;杜守东 1997;于蜀,张茂林 1998;徐伟 1999)。

2000 年人口普查时,我国大陆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普查人口中,跨省迁移流动的暂住人口达 4241.86 万,占全国总人口的 3.35%。目前,据估计我国迁移流动人口总量逾 1.4 亿,其中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的逾 8500 万。

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的农村劳动力专项年度调查,1997~2000 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从 18.1%上升到 23.64%。农村转移劳动力总量则从 1997 年的 0.832 亿、2000 年的 1.134 亿,上升到 2003 年末的 1.695 亿。年均增长速度从 1997~2000 年的 10.90%提高到 2000~2003 年的 14.34%。其中 58%,即接近 1 亿的转移劳动力为外出就业。其中流入广东省的农村劳动力占 2000 年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劳动力抽样调查总量的 51.6%(刘传江 2004)。

二、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和迁移选择、迁移方式

随着我国人口迁移规模的迅速扩大,统计调查资料不断丰富,对人口迁移的研究也从一般性、趋势性分析,转变为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利用各种计量方法,并引进西方各种理论对引起我国人口和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进行多方面分析¹⁾。

1) 杨云彦,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研究的进展与评价,1998 年青年人口学者会议论文。